

省港澳 大众文化与 都市变迁

程美宝 黄素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省港澳 大众文化与 都市变迁

程美宝 黄素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程美宝, 黄素娟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097 - 9803 - 4

I. ①省… II. ①程… ②黄… III. ①文化发展 - 研究 - 中南地区 ②城市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南地区
IV. ①G127.6 ②F299.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9173 号

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

主 编 / 程美宝 黄素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孔 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803 - 4

定 价 / 10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项目号：11200-52010005）资助成果

本书作者

(按姓名拼音排序)

- 卜永坚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蔡思行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
陈晶晶 广州日报社
陈丽华 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程美宝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戴淑茵 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
丁 蕾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部
何文平 中山大学历史系
黄爱玲 香港电影资料馆
黄健敏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黄素娟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黄晓恩 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黎俊忻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
潘淑华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沈秉和 澳门瓦舍曲艺会
宋钻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谢少聪 罗 韵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
曾金莲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张宝珊 澳门天主教海星中学

前言

近十年来，我把较多精力投入到华南粤语地区大众文化研究，并逐步聚焦到以16~20世纪“省港澳”三个都会城市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十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研究，发表和编撰了好些文章和专著，完成了数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我们的研究主要依托两个研究项目来进行：2009~2012年由我主持的以“近代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为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及从2014年起由我主持的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的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借着这些项目的资助，我得以组织研讨会，汇聚研究兴趣相近的学者，集思广益。2012年9月，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组织了“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以“省港澳”为名，参加者大多来自省（广州）、港（香港）、澳（澳门），由于好些因缘的、历史的原因，自然而然地也邀请到来自上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在本书的一些讨论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大凡论述“省港澳”，便不能忽略“沪”，而由两座“金山”所象征的美洲和大洋洲，也是许多来自四乡再经省港澳外出闯荡的人的目的地。无独有偶，该次会议在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某宾馆举行，旁边就是近代著名买办郑观应的家乡雍陌村。郑氏生于雍陌，但大半生活跃于上海，又在澳门建置大宅寓居多时，这样的经历，也是许多中山人的写照。我们身处这家现代化宾馆的会议室和客房，很容易会忘记其实我们身在乡村，但这个乡村并没有因为它是“农村”而与世界隔绝，因为它连通澳门，与香港也不过是一水之隔。我们要理解这些人及其时代，不应独去他们的家乡“寻根溯源”，而必须首先从省港澳出发，才能一窥他们的大世界。

该次会议后，我们得到部分与会者的首肯，征集了他们的文章，加上编者个人的几篇相关论文，加以修订，组合成眼前这本书的格局。我们从城市

规划和现代景观讲起，是因为不论是省城（广州）、香港还是澳门，都是“都市”，自然也都经历了一个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过程，到19世纪末，形成了某种十分类似的现代景观。三地既是珠江三角洲的铁三角，自远古迄唐宋都是海上瀛洲，自明清乃至近现代要拓展商住范围，都得靠填海（河涌）造地。省城的西关和长堤、澳门的下环、香港的西环，以至20世纪下半叶香港新界沙田海两岸因填海工程而长出一条“城门河”，均是城市发展的结果（见“城市规划与现代景观”各文）。这些商住地区往往也是娱乐场所云集之处，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省港澳及四乡最流行、最具商业价值的大众文化，则莫过于戏曲和电影。清末广州、澳门和香港的戏院便分别集中在西关、下环和西环。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投资者或经营者时就会明白，某企业或商号“位于”何处，不应轻易被定义或定性为“广州的”、“澳门的”或“香港的”。何贤家族“二战”后在香港经营的戏院便是一例（见“演出场所的建造经营”各文）。毕竟，不论是工商学绅、贩夫走卒、歌伎名伶还是党徒盗匪，其在省港澳间的流动聚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不会因为三地分属三个政权而有所限制。个人的去或留，往往是基于对摆在眼前的选择的衡量，而非对意识形态取向的考虑（见“人群聚散与资源流动”各文）。

都市的变迁也反映在大众文化的演化上。游泳健身并非都市独有的活动，但在运动场按照游戏规则举办区域性或全国性竞赛，在备有一定设施的场所游泳，并且要遵循一些公共规矩，则无疑是都市人的玩意儿。香港的南华会和上海以粤人为主的精武会，正是此种活动的积极推手。即便是“传统”的武术，经过现代媒体（铅印小说、电影、电视）的包装，也能再造传统、生产英雄，造就像“黄飞鸿”这类风靡省港澳以至海内外的形象（见“竞技运动与身体政治”各文）。知识分子热衷宣扬的民族意识，在20世纪往往表现为革命话语，通过在城市新兴的博物馆和展览会向大众传播。有时候，对民国政局时弊的愤慨、对现代市政建设的不满，无须通过国语新文学来表达，而可以像廖恩焘般，用粤语旧诗体来冷嘲热讽（见“革命话语与民族精神”各文）。

当粤语书写“还原”为口语，再经空中电波广播，地域就更加不是区隔和分类的准绳了。本书大多数文章以省港两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正如前文所说的，要更确切地理解20世纪中期以前的省港澳，不能不关注大上海。

19 世纪中期开埠之后，沪上因为有大量的广东人当买办做生意，可以处处听到“广东声音”，这种以“省城白话”为标准的“广东声音”，在各种音乐玩家的同乐会中流传着，在戏园或戏院里逐步发展着，再依靠广播技术的兴起通过空中电波得以无远弗届地远近共享。然而，随着 1949 年中国政权的变易，港澳和广州越走越远，就连“广东声音”也变成有“大陆腔”和“香港腔”之别，粤剧发展也有两地分途之势。有趣的是，由上海和华南影人共同成就的香港电影事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摆脱上海甚至华南的烙印逐渐树立起“香港特色”，时至 20 世纪末，竟然是通过将“由沪而省而港”的《七十二家房客》，用借尸还魂的形式演化为《功夫》去表达，并且获得票房上巨大的成功，最后片中更隐喻着香港电影借大上海做大中华梦，全面进军内地市场（见“粤人之声的扩散变易”各文）。

也许，“省港澳”中的“省”就是在香港的“大中华意象”中逐渐消失，而越来越被“粤”所取代的。一字之差，象征着一个多世纪里发生的种种政治社会变迁；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身处省港澳各地不同世代的每个个人的认知和表达上（见“导言”）。就好像这本书一样，诸位作者遍布省港澳沪，老中青俱全，各人书写的历史，受其身处的现实所牵引；其感受的现实，又为其认识的历史所形塑。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必定会发现，在相对于“港”的论述中，不同作者在“省”“粤”“中”，甚至“西”等字眼的采用上各有不同，在某些方面与“导言”隐含的主张颇有相左，我也曾为此感到纠结。不过，后来将全部文章读完，不但感到从诸位作者的讨论中获益良多，更觉得这样的差异，恰恰印证了我所指出的近百多年来发生了从“省港澳”到“粤港澳”种种事实与言辞之变化并非无的放矢。“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可以预计，这本集众人之力结成的小书，也将成为日后研究这个地区曾经有过的论述的一个样本。如此，则“省港澳”也好，“粤港澳”也罢，都没有什么可揪心的了。

程美宝

识于九龙塘香港城市大学

2016 年 2 月 29 日

目 录

导言 从“省港澳”到“粤港澳” ——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	001
--------------------------------------	-----

城市规划与现代景观

第一章 18~19 世纪下环区与澳门城市化	021
第二章 破墙而出：清末民初广州西关地区景观的延续与变迁	032
第三章 城市建设与土地产权 ——以清末广州兴建长堤为例	049
第四章 20 世纪上半叶广州的道路修筑与城市规划	065
第五章 “香港的莱茵河”：“二战”后新界河道修复与新市镇成败的 关系	083

演出场所的建造经营

第六章 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	097
第七章 晚清澳门中国戏院初探	122
第八章 何贤家族与“二战”后香港戏院业的演变	134

人群聚散与资源流动

第九章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 ——以匪患为例	167
第十章 20 世纪粤剧从业人员的流动	187

竞技运动与身体政治

第十一章	闲暇与身体政治：民国时期广州的游泳时尚·····	205
第十二章	运动竞赛背后的竞赛：1924 年全国运动会及其 引发的争端·····	223
第十三章	走向公众：20 世纪上半叶粤港地区黄飞鸿 形象的塑造·····	234

革命话语与民族精神

第十四章	民国时期公共展览的策划与展示 ——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建立为例·····	257
第十五章	乡邦文化与民族精神：李仙根与 1940 年香港广东 文物展览会·····	276
第十六章	廖恩焘和粤语文学·····	291

粤人之声的扩散变易

第十七章	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 粤乐和粤曲在上海·····	325
第十八章	播音里的广东声音 ——兼论地域文化在上海传播的原因·····	353
第十九章	由“大陆腔”一词引出的思考：粤剧“芳腔”探微·····	367
第二十章	从粤剧《再世红梅记》看多元文化的现象·····	380
第二十一章	从《七十二家房客》到《功夫》：谈香港电影史上 三个关键阶段的面貌·····	386

从“省港澳”到“粤港澳”

——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

程美宝

楔子：看不见，唱得出

1975年，警师杜焕（1910~1979）在香港上环富隆茶楼以粤语龙舟腔演唱《大闹梅知府》，在开场白中说道：

咁呀，初初出身哩走江湖嗰阵时呀，就系唱龙舟。系哩四乡岛哩呀，咁呀唱龙舟嘅。后至喺河南哩嗰阵唱南音喇，咁所以转咗南音。咁呀，在茶楼唱龙舟哩好耐嚟各位，我曾经系同我地个行家盲华喺西环啲

* 笔者近年发表了一些以广州、澳门、香港以及上海粤籍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对省港澳三地的关系做过一些粗浅的思考。这些文章包括《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世界》（《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Pidgin English 研究方法之再思——以18~19世纪的广州与澳门为中心》（《海洋史研究》2011年11月）、《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16~19世纪华洋交往中的小人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破墙而出：清末民初广州西关地区景观的延续与变迁》（载苏基朗主编《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动态发展：人文空间的新视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省港声香味——从20世纪20年代两地画报所见》（载陈平原、陈国球、王德威主编《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等。本章的主要观点，乃综合上述各文而成，并已在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一辑（金城出版社，2014）发表。个别课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相关文章。

间嘅建苑唱到过家下喇，喺茶居唱龙舟就。好喇……①

杜焕说起“四乡”“河南”“西环”时，是何等的朗朗上口——四乡是省城的腹地，与省城水陆相通；“河南”就是省城暨珠江以南的“河南岛”，属乡郊地带，长年是货栈盐仓之所，尽管靠北的部分也纳入晚清的省城地图，在民国时期属广州市管辖，但不能跟省城同日而语。对于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是香港人来说，“四乡”“河南”甚至“省城”，都显得很遥远、陌生，但对于这位生于20世纪初、在襁褓中三个月大即失明的歌者来说，从四乡到广州河南，从广州河南到香港西环——为了生计，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地方于他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世界。

这段开场白是杜焕对其个人经历的回忆。有趣的是，杜焕不仅记得他实实在在的个人经历，他的演唱更残存着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的印记。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妓院演唱的板眼《两老契嗌交》（又名《烂大鼓》），后来在1975年再演唱录制，其中便有这样一段唱词：

讲到打官司唔似我咁地利

讲出来就吓死你喔

我认老窦哩，做知台（另场唱：埋头执吓马屎）

我阿叔哩，做布政（另场唱：持鸡尾）

大伯父，喳喳地都系将军嚟（另场唱：衙门埋头打更就和扫地）

我大佬呀，南海县（另场唱：咁就拉板子呀）

细佬系河泊所，保住你喇啱！（另场唱：出入周时捧住嗰条叫做青龙旗）……

① 《〈玉葵宝扇〉之〈大闹梅知府〉、〈碧蓉探监〉——警师杜焕演唱龙舟版本》光盘，荣鸿曾、吴瑞卿编辑、策划，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2012。曲词由荣、吴整理，见光盘所附小册。开场白大意是：“我最初出身行走江湖时，就是唱龙舟的，是在四乡唱的，后来到广州的河南岛就转唱南音。我在茶楼唱南音已经很久了，曾与‘盲华’在香港西环建苑一起演唱，在茶居就唱龙舟。”其中，“四乡岛哩呀”的“岛”字，应该是象声词，是“处”“哪里”的意思。

原来你系一个偈头光棍认做行商^①

这分明是清代人对广州省城官衙的印象，而靠洋行贸易富甲天下的行商，在这段唱词中也有一席之地。这首《两老契嗌交》更直接的背景应该是广州珠江河畔陈塘烟花之地。杜焕应该是在河南岛或省城跟他的师傅学过，后来把这首曲子“带”到香港的庙街演唱的。

杜焕，广东肇庆人，1914年珠江西水泛滥，父亲离世，家庭顿入困境，母亲将他送到一位失明老师处学艺。未几，杜焕在河南岛南华西环珠桥附近机缘巧合认识了一名师傅，学唱南音。20世纪20年代，内战频仍，广州市面混乱，杜焕与几个师兄经中山石岐到澳门，1926年辗转到香港，开始在油麻地、旺角等地卖唱。约从1955年开始，杜焕在香港电台定期演唱南音，至1970年节目中断，幸获老顾客接济。70年代以后，南音在香港被一些学者重新发掘，杜焕亦应邀在大会堂等正式表演场地演出。1975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荣鸿曾教授的安排下，杜焕以富隆茶楼为表演场地，录制了一批南音、板眼和龙舟，这批作品近年陆续出版，使我们有幸听到旧日的声音。^②

在学者的努力下，杜焕的声音被留住了，是当之无愧的“绝世遗音”“文化瑰宝”。不过，如果仅仅说它是“香港的”，则未免贬低了它的价值。事实上，杜焕的经历跨越香港一隅。杜氏生于肇庆，在广州（河南和省城）入行，经中山石岐、澳门抵港，最终长住香江并在此地终老，他的经历，正是许多从乡下到城市寻求生计的人，在省港澳三地间往来穿梭，最终因某些历史原因而“定格”一地的写照。杜焕的声音，实际上也是“省港澳”这

① 唱词据杜焕唱《板眼：两老契嗌交》（收入《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之三》光盘，荣鸿曾、吴瑞卿编辑、策划，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2011）所附小册第16页，原文“荷薄所”应为“河泊所”之误。大意是：“谈起打官司，你就不像我那么厉害了，我说出我的后台来，一定会把你吓坏。我的爸爸是知台（按：‘知台’并非正式官衔，据下文的官阶顺序，可能他想说的是‘抚台’，即巡抚），我的叔叔是布政使，我的大伯父是广州将军，我的哥哥是南海知县，弟弟是河泊所官，这还不能保住你？原来你也不过是个空心老倌而已，却装成是行商！”括号内的“另场唱”指唱者装成第三者从旁插嘴讽刺两个主角吹嘘夸大。

② 杜焕生平见《失明人杜焕忆往》光盘所附小册，荣鸿曾制作，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4。

个曾几何时的文化共同体的声音。我们听懂了，就能“听到”更多过去的历史。

“省港澳”这个用词，大约是在杜焕出生前半世纪开始通行的。如今，“港”“澳”二词大抵不会引起什么误解，但许多人已经不知道“省”指的是“省城”，也就是狭义的广州，而误以为是指广东全省。把三个地名连作一词的例子，较早很可能就是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省港澳轮船公司”。^①至晚清，“省港澳”特别是“省港”一词，不论在官方文献、报刊，抑或是通俗小说，都触目皆是，加上粤商在各城市以联号分支的形式创办企业、制造货品、营销服务，“驰名省港澳”更成为清末以来各种商业广告常见的宣传语句。事实上，在许多人事活动与场合中，“省港澳”都呈现出一种一体却又分立的关系，这在经济不景气或政局动荡时尤为明显。为清楚起见，以下权且分而论之，但恰恰由于上述联系，论述中不免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省城的行政地位与都会气象

所谓广州“省城”，指的是明清时期广东全省的政治行政中心。由于围绕官衙而建并发挥防卫作用的是四壁城墙，这样的建置景观顺理成章地被称为“省城”。“城”在这里应形象地理解为城墙及其所包围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具备近现代意涵的“城市”，尽管省城连带其附近的商业地带往往会呈现出一种都会气象。由此定义出发，广州建城，从史籍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敲，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任嚣、赵佗修建增筑的城池，其后历朝屡有扩充。由于今中山五路的高地自宋以来便传说是禺山，又认为番禺城是择高地而建的，因而该处被视为地望所在，历代建城大体皆以该地为中心。随后重心稍向西移，至明初扩筑北城至越秀山，建五层楼，由北而南形成的中轴

^① 笔者一时未能找到更多直接与省港澳轮船公司有关的专著，暂据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 (<http://60.250.180.26/ss/651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0月15日)。该网站谓1849年英商在香港成立了“Hong Kong Canton Navigation Co.”，1854年香港半岛东方汽船航运公司（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经营来往于澳门、香港、黄埔和广州间的客运，1865年由英国与葡萄牙航商联合组成的公司，则命名为“省港澳轮船公司”。

线更是明显，至20世纪落成的公共建筑，包括民国时期建成的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市府大楼、中央公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的市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大楼，大体都坐落在这一中轴线上。换句话说，两千年来广州城的中轴线基本维持不变，这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城市当中实属罕见。广州省城的政治中心性在长时段的物质建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明清时期筑建的城墙范围，基本上定义了此后人们心目中的“省城”的边界。北城在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扩建，北面城墙向东北伸筑至象岗脚，沿越秀山北到桂花岗南，沿山水井坑东南和越秀路接大东门，以五层楼为制高点，南至归德门、正南门，即今天的大南路、文明路所在。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北城的南界再向南扩展，新城将北城外的繁华商业区包围起来，新城南面的城门大抵位于今天的一德路至万福路上。至清代，城池的东西南北四隅已无扩充余地，只能利用城南珠江北岸的滩地，顺治初年在新城以南两侧加建翼城为护。^①套用今天的道路系统来理解，明清城池的范围，就是北至越秀山，东至东濠涌高架桥，西至人民路，南临珠江。人们所说的“省城”，狭义的定义指涉的只是这个范围，在新中国成立前成长的本地人，今天不假思索地用到“广州”一词时，往往也是指旧“省城”这个范围，换句话说，城外和河南的地方，不被认为是“广州”。“历史心性”或“历史记忆”使人们对眼前世界的认知有异于当代行政的界定。当人们这样界定“省城”或广州时，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这片地方作为行政中心遍布机关衙门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的认知。“赴省城办事”，往往说的就是跟衙门机关打交道。

然而，“省城”的意义又溢出其行政意涵。“省城”二字散发出一种都会气息，城外包括河南地区也发展出许多乡村与聚落，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地方是郊外，始终不如省城。直到最近，仍然有“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说法。这种都会气息是由商业繁荣带动的，而省城在清代所呈现的商业繁荣，是数百年来中外贸易的结果。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墟市”篇谓：“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纷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轰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竞街兼

① 有关广东省城历代建置参见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下篇第3章。

巷……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① 这个所谓“墟市”，主要是指西关。由于在城内发展有所局限，绝大部分商业皆集中在城外西面这块水网交错、交通方便，又能堆填成陆、建筑楼房的地带。西关是十三行及夷馆所在，横街直巷布满无数大大小小的批发店和杂货店。1875 年在香港出版的 John Henry Gray 所著的《漫步广州》（*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一书，对广州省城各区的街巷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详细地记录了位于西关地区的商号及其售卖货品的种类。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当年在西关大街小巷售卖的货品不但有禽畜、猫狗肉、茶叶、生烟、衣布、绣巾、绳缆、灯笼、蜡烛、锡材、金鱼、金银纸扎、殡仪用品、日晷、罗盘、瓷器、洋瓷、铜器、漆器、玻璃、木雕、酸枝家具、玻璃画、玻璃灯笼、珍珠贝母装饰、燕窝鹿鞭等名贵中药，更有来自海南及马六甲的槟榔及椰子、孟买的棉布，甚至曼彻斯特的货品和英国各地的五金器具。这里的玉石匠打造的玻璃手钲是一种仿冒玉钲，买家包括巴斯人（Parsee）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Mohammedan），他们把这些广州制造的产品，分别转到孟买和加尔各答售卖给印度女顾客。这里除了有至今尚存的华林寺、西来初地和锦纶会馆外，还有西禅寺、仓沮祖庙、徽州会馆、乞儿头会馆和开设门诊的爱育堂，也是“伍浩官”和“潘明呱”等行商大屋的所在。固定的商铺似乎不足以满足需求，这里还有一个清晨 5 点开始 8 点结束的旧货墟和“天光墟”。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当然少不得银铺和典当业，外国人甚至把西关的一条街道比作伦敦大小银行和放款店林立的“Lombard Street”。^②

销售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娱乐和房产生意，西关陈塘在清末民初是歌舞平康之地。晚清广州较早的戏院在 1889~1890 年兴建，位于多宝桥外。“戏班眷属多住在黄沙、恩宁一带”，恩宁路是今天八和会馆的所在，附近一带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住有不少戏班中人，可见这种清末形成的格局的延续性。^③ 西关的宝华路一带自同光年间已发展为住宅区，有街有市。至清末，泮塘、南岸附近一带的沼泽地越来越多地被填为陆地，商人在其上发展

① 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五《建置略二·墟市》，第 18~19 页。

② 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De Souza & Co., 1875) .

③ 《南海新秋》，《申报》1896 年 9 月 9 日。

房地产，很快便有人购买或租住，并沿用乡村“约”的方式建立街区组织。^① 广州笼统称为“西关大屋”的各式民宅，就是在这时陆续发展起来的。今天年届八旬的“老广州”，谈起“贵族住的地方”，还有“河南岐兴里，河北宝华坊”的记忆。^② 在宣统《南海县志》中列举的西关地区街道便有1700多条，门牌4000多个，可见人口之密集。^③ 如此浓厚的商业和消费氛围孕育出“西关大少”和“西关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西关商人和文人阶层所操的粤语，发音清晰细腻，舌齿音尤为明显，以致成为人们不知不觉仿效的楷模，即所谓“西关话”，^④ 20世纪更成为粤语戏曲、广播和有声电影演员的发音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西关”不只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人们向往的有助于爬上社会阶梯的文化象征。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日后香港和澳门的华人精英阶层的文化非常关键。

民国肇始，广州的市政规划逐步走向现代化，“拆城墙，建马路”很快被提上议程。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结束了广州分属番禺、南海的历史，帝国时期的省城建置亦为现代的市政机制所取代，大规模的拆建工程由是展开。1922年，城墙基本全部拆清，城内城外连成一片。城墙拆毁后留下的空地也成为第一期新辟马路的基础。一方面，西关仍然是“本市最冲要之区，商场云集，交通频繁”，有“亟应开辟马路”的需要；另一方面，原来城内的街道很快发展成以今天的北京路为中心的商业街区，繁盛程度与西关相当。^⑤

① 《珠海近闻》，《申报》1897年1月24日。

② 笔者与孔宪珠先生闲谈，2010年8月28日，广州。孔先生是广东粤剧院演员，长居广州，改革开放初期因出演电视连续剧《万花筒》中的“胜伯”一角而家喻户晓，1986年主演珠江电影公司制作的《绝响》更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不论从其个人经历还是扮演的角色看，孔先生均堪称“老广州”。

③ 宣统《南海县志》卷六《建置略》，第3~4页。

④ 在清代的中文文献中，不大可能出现“标准粤语”的说法，只会有语音“清浊”的评价，但当外国人要学粤语时，则必须面临一个口音选择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在香港任职传译员的英国人 James Dyer Ball 便注意到，所谓“纯正的粤语的正确发音”（“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pure Cantonese”），应以西关话（他翻译为“West End speech”）为准，见 James Dyer Ball,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refaced 1883, for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A. Dyer Ball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Ltd., 1924)。

⑤ 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广州的城市建设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黄素娟《城市产权与都市发展：近代广州市区规划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13。